

中 国 经 济 管 理 名 家 文 丛

汪 康 懋 政 策 论 文 集

企业价值：资本市场中的原富

Q I Y E J I A Z H I

Z I B E N S H I C H A N G

Z H O N G D E Y U A N F U

汪康懋 著

朝華出版社

中 国 经 济 管 理 名 家 文 丛

汪 康 懋 政 策 论 文 集

企业价值：资本市场中的原富

Q I Y E J I A Z H I

Z I B E N S H I C H A N G

Z H O N G D E Y U A N F U

汪康懋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企业价值：资本市场中的原富/汪康懋著. —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7
(中国经济管理名家文丛)

ISBN 7-5054-1317-1

I.企... II.汪... III.资本市场—研究—中国—文集 IV.F83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75228号

企业价值：资本市场中的原富

作 者 汪康懋
出 版 人 田 辉
策划编辑 王景伟 管理学家/慕云五

责任编辑 王三石 马海宽
助理编辑 袁 莉
责任印制 赵 岭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35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68433188(总编室)
(010)68413840 68433213(发行部)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刷装订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635×965毫米 1/16 字 数 235千字
印 张 18.5
版 次 2006年8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版 别 平
书 号 ISBN 7-5054-1317-1/G·0695
定 价 28.00元

“亲民、亲商、爱国”六字肺腑之言实践我的富国梦

(代序)

我，汪康懋，一个执著而有效地实践着富国梦的爱国者和智者，一个真正意义的东方之子，亲民、亲商、爱国，用自己的学识和智慧为国家、为百姓创造了十万亿元财富。

文革后中国第一本公开出版的译著

时间：20世纪70年代初

场景：云南文山边陲小村

云南文山，离边境仅几十公里的土族小山村，一间昏暗的小茅屋，一盏劣质的小油灯，几块土砖和粗糙木板搭起的睡铺兼书桌，这就是我当年翻译《林肯传》时的生活环境。每天，在劳作了十几个小时农活后，我就在这里一字一句地翻译着《林肯传》。油灯的烟灰几分钟便会将我的鼻孔熏黑并积塞了烟黑，缺纸，用稻草杆一挖，鲜血滴滴。就这样，历经数艰辛，终于完成了百

万字《林肯传》的翻译。

国家出版局收到译稿，派调查组来当地农村调查时，农民们个个竖起大拇指：“康懋是个艰苦奋斗的好知青，志向远大又脚踏实地。”调查组组长是人民出版社的张社长，他看到我的处境，流下了热泪：“正是由于在边陲，没有任何资源的条件下，才真正体现了你的价值。”1978年，这部译稿作为文革后中国的第一本外文译著公开出版了。

1979年，访美的邓小平将中文版的《林肯传》与美国参议员英文版的《林肯传》做了互赠交换。在中美关系并不明朗的年代，在农村劳动的艰苦岁月，我，汪康懋，一个上海交大附中67届高中的插队知青，能以前瞻的眼光，翻译美国共和党第一任总统林肯的传记，人们不能不佩服我的高瞻远瞩。

我的富国梦，植根于我云南边陲的九年磨练。在辛劳和汗水中，我切肤体验了中国的国情和中国底层人民的疾苦，发奋要为国家，为民众，创造出和美国一样多的财富，我的富国梦植根于中华大地，是坚实的。

同代学子中响亮地喊出“振兴中华”

时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地点：北京大学

1978年，从小以爱因斯坦为楷模、年届而立的我，以中、英文全国状元卷考入了北大物理系。为追回蹉跎的岁月，我学习得更加勤奋刻苦：广泛涉及天体物理、理论物理、经济、语言学、社会科学、国土学题材的一篇篇论文，在全国一级的学报上频频发表，连年获得北大五四科学论文奖，我是文革后北大第一个走上全校讲台作学术报告的本科生。当时，我的题为《社会科学中的定量研究方法》的学术报告，在文科同学中反响巨大，五百人的阶梯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甚为轰动。

我的成绩引起了校党委的重视，被评选为全校十三位尖子生之一。校长韩

天石、党委书记马石江将我推荐给有关部委，参加了一个研究小组，专为中央进行经济策略的研究和撰写报告。我和李克强等尖子学生还组成了边缘学科讨论组，周末，喜欢让创新的激情和思想的火花相互撞击的青年才子们，常常相聚在北大46楼的宿舍里，为一些前沿课题展开讨论，彻夜长谈直至天明。

1981年3月，女排夺冠，全校沸腾。当时北大校报刊出了一篇“把爱国主义激情落实到争取三好上”的报道，报道中惟一提到的学生：“平时学习很好的物理系三年级学生汪康懋表示：要以实际行动实践‘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愿望，他在最近出版的《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他决定抓紧工作，还要完成一篇和我国经济建设有关的论文，争取在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发表。”

在转向经济建设的历史时刻，感恩于邓小平的新政策，我，汪康懋，一个学有所长的北大学子，代表新一代中国大学生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并将这四个字贯穿于我的富国梦，当时我不仅在《北京大学学报》，而且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报》、《物理学报》、《科学探索》等学报也发表了众多有实用价值的论文，国家国土资源局当时就采用了我的《人口国土场研究方案》。

第一个被国家科委采用的评奖方法

时间：20世纪80年代初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

1982年秋，我从北大毕业进入上海交大管理学院任教，科研活动空前活跃，在交大学报和国际系统控制论年会上发表了一系列优质论文，其中关于人口场的论文受到了钱学森教授的多次来信肯定。

我带领的一个小组在向上千位专家函调后，创立了一套科研成果的评价体系，不仅被国家科委采用为“全国科技进步奖”的评奖方法，而且评价体系本身也被国家科委颁了奖。至今，这仍是上海交大管理学院获得的惟一奖项。

1984年春，我又考上了国内著名大学研究人口地理胡焕庸教授的公费博士研究生。照例，我完全可以顺当、安稳地走着一条国内传统的大学名教授之路。然而，我得知了一个信息：中国急需发展的是金融业，国家最缺的是金融人才，应该到经济最发达的美国去学习金融！尽管到美国学金融必须是自费的，尽管自己在美国举目无亲、身无分文，但我生性好动、勇于闯荡，感到自己必须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自己有责任到第一经济大国去学习金融！1984年底，我带着仅有的30美元，远赴美国了。

第一个进入华尔街、第一个提出稳定汇率政策

时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90年代早期

地点：美国纽约华尔街

在纽约那个寒冷的冬天，作为一名自费留学生，我度过了又一段艰辛拼搏的日子。我以GMAT的高分，考入了纽约大学斯顿商学院攻读金融学位，该校金融学科全美排名第一。那是一所地处华尔街排名前十位的著名商学院，鲜有中国学生考入。我一边攻读学位，一边在晚间和周末进入华尔街最大投资银行的研究部担任分析师，每天工作十六小时，由此，我迅速掌握了华尔街的脉搏和金融工具的使用。

1987年我刚获得金融管理硕士就进入了全球最大投行Merrill Lynch的资本市场部，成了首批进入华尔街的中国精英之一。由于我的思维创意活跃，被在美国的中国第一个留美学术团体——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三百多名会员民选为早期的两届理事。为了积极参与中国的经济改革，我又作为创始会长筹建了中国旅美金融学会，并筹到了美国有关方面的学会资金，这两个团体每年赞助国内经济学研究的高层人士来美国考察访问交流思想，从而培育了一批现在在国内财经界担任高层领导的干部。

还在攻读学位时，我就一如既往地密切关注着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与世

界经济的发展。由于我在华尔街熟悉了资本市场，又仔细观察、研究了日本等国的经验，因此，早在1986年我就连续发表了创立中国股票市场的重头文章。特别是我1986年发表的有重大影响的《中国经济改革的优先与策略》一文，当时，许多西方经济学者认为中国应该贬低汇率，推行价格双轨制。而我则根据自己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在文中不惜与著名学者辩论，一反经济学的传统理论，建议中国应该稳定汇率；文中还提出，设立股票市场，分设A、B股市，开通国际资本通道，中国企业到海外上市，大规模发行外债，出售土地使用权，实行住宅商品化等等，全面与国际接轨等重大政策建议，此文受到了中国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国务院领导认为我思路开阔，有独到见解，迅将此文批转给人民银行和国家体改委研究执行，该文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后来成为国内众多政策的基础。

1988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国内外一片悲观论调，我又及时向国务院领导倡议实行金融调控措施和保值储蓄方案，银行连续六年实行保值储蓄，年息高达20%。直至今今，我还不断以自己的行动与论文来支持稳定人民币汇率的观点。

中国驻美大使韩叙多次将我从纽约请到华盛顿使馆密室长谈，倾听我对国内改革的看法、建议，并将录音带及政策论文，带回国内，供高层领导参考。我当时的许多政策建议至今读来，仍然是切实可行的。例如，90年代初我就提出的关于浦东开发区的金融与高科技定位、关于中国90年代出口的各种拳头产品、关于中国银行改革与中国企业改革紧密结合、关于应狠抓企业集团、高科技企业、民营乡镇企业、关于中国及时参与亚太经济整合，以及出售土地、发行外债、社会保险、抵押贷款银行、证监会、银监会模式等等建议，至今还充满了活力。我的政策文章还常被送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或进入内参。朱镕基率中国市长代表团访美时，代表团成员人手一册我的专著《世界经济格局下的亚太、中国和香港》。香港红筹公司的总裁们、国家的许多高级干部也都认真阅读了我的政策论文集。

我在早年第一次大胆提出稳定人民币汇率这个策略时，正如香港《文汇

报》总结的：“这些建议的实效性已逐年显现，当汪康懋提出稳定汇率的1986年我国的外汇储备仅为100亿美元，到今年已高达4700亿美元。”当然其中有各方面的因素，但无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我开创性提出的一系列参与国际资本运作、开发国际资本来源的建议所产生的实际成果，国家增加的资本总额达到16000多亿美元，相当于全国居民储蓄的总额（我的稳定汇率政策使外汇储备增加4300亿美元，海外上市政策建议与实践使国家增加3000亿美元，大规模发行外债建议带来2000亿美元，出售土地使用权的政策带来5000亿美元，这四项已为国家创造了十万亿元财富）。

由于保值储蓄方案使通货膨胀被压抑，中国亿万人民因此受惠，实现了藏富于民，我被《时代财富》杂志称为“中国百姓的财神”。对此，国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的该篇论文与陈省身、杨振宁、李政道、田长霖等学者的论文一起发表于90年代中期国务委员张劲夫主编的《海外学者论中国》一书。

正如证监会副主席屠光绍在我的新著《汪氏模型》序言中所写：“令人欣慰的是，汪康懋博士为国家作出了贡献。我对汪康懋博士在留学期间为我国证券业所提出的众多良策时有所闻。从80年代中期起，他提出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资本市场的创立，A、B股的分设，证监会监管模式的确立，中国企业赴海外上市，乃至银行系统的改革、稳定汇率、住宅商品化、抵押贷款证券化等政策建议。中国证券市场能有今天这样的规模，也包含着汪康懋博士的智慧和爱国热忱。”

挺身而出帮中国渡过难关

时间：1989年以后

地点：美国、香港

1989年后的一段时间，中国经济政治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和低潮时期。美国一些人大肆叫嚷，要重新封锁、孤立中国，对中国实行最严厉的经济制裁，

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对共和国充满了感情的我，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但是，我懂得，物质是第一性的，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对务实的美国人来说，商务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当时，我刚好转到Paine Webber公司投资银行部任职，分管美国航天工业36家大公司的投行业务，如波音、洛克韦尔、诺斯罗普等（这些公司主要生产飞机、导弹、电子仪器等），定期会见这些公司的CEO，我的工作还包括研究分析美国的国防预算等，因此，我掌握了美国航天国防工业的大量经营数据和整体处境，我从美国商界的利益立场进行分析，运用大量的第一手数据、资料，并用自己的真名及职务在美国、香港发表了一系列重头文章，说服美国取消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这些文章对美国决策当局深具说服力。

我是当时数十万海外学子中惟一个大胆站出来，不顾自己在美国的地位和发展前景会否因此受影响，大胆发表了这一系列文章。香港的徐四民先生读到文章后，深为感动，《镜报》立即为我发了两万字的长文并提前五天出版，使香港商界赴美游说团能够以我的文章为主要参考资料。香港回归祖国前夕，我又发表了给特区行政长官的经济政策建议书，解剖了香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对策，目前香港的财税政策基本沿用了我的财税方案。我以自己卓有成效的行动表明了一个东方之子对国家的忠诚。

国家领导人曾说：“汪康懋对国家有大功。”因而，1994年国庆，我作为北美的惟一代表受到国务院邀请，回国参加观礼。国家并邀请我主持中国海外第一股的创建与发行。

亲手将第一面五星国旗插上华尔街

时间：1992年

地点：纽约及西方10个中心商业城市

我接到主持中国海外第一股的创建与发行这个任务时，正值90年代初，

西方对中国仍然心有疑虑，并带有严重的有色眼镜，华尔街并没准备要接纳中国企业，整个华尔街没有中国业务。当时国内的会计制度还没有与国际接轨。中国企业与西方金融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和隔阂，误解与歧视很深。

我在中国海外第一股的发行中，当了一名艰苦的架桥工。我以个人的魅力及信誉说服了一系列专业人士，从退休的美国证监会主席路德到现任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到国际投资银行家、会计师、律师、纽约证交所、美国证监会高层主管。我还做了一些精心设计的运作，如一般只需招两家投资银行做主、副承销商，而我找了华尔街最大的三家投行做主、副承销商；我领导协调了由投资银行家、会计师、律师组成的专业班子，用三个月时间高效率完成了重组、实地考察、审计、法律审查、招股书起草、美国证监会注册、路演、定价，我及时圆满解答了美国证监会的一百三十多条问题，解决了许多会计和法律方面的难题；我还精心编制了八分钟令西方震惊的路演录像带，并亲自主持了全球十个城市的路演。

我一口流利的英语加上恰到好处的幽默，抓住亮点，准确的陈述及生动的演讲，征服了初次面向中国企业的西方投资银行家及投资人，在纽约路演会场汉墨斯莱酒店吸引到的基金经理人数比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同一会场举行的路演多出两倍，股票获得了空前的12倍认购，并取得了至今为止，中国股票海外上市的最高价格（35倍市盈率）。一个1亿元净资产的普通企业，发行市值达29亿元，上市当日市值达36亿元，一个月后升为63亿元。这个成功上市被华尔街评为“全球十优”，为中国打开国际资本市场积累了经验，西方五十多家媒体称赞我为“连接中国和西方的桥梁”，“中国股份制国际化的开拓者”，“中国企业海外上市之父”。现任美国驻华大使，原Gibson, Dunn & Crutcher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雷德感慨地回忆说：“康懋运用他很深厚的金融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不但解决了中美两国会计准则差异带来的问题，而且作了优秀的路演，从而成功实现了中国企业第一次在纽约股市上市。他对西方资本市场实务及中国国情的深入理解使他成为这一历史性零的突破的关键人物。没有康懋卓越的沟通能力，没有他在两个国家金融业界作出高难度的跨文化

沟通，这次历史性的成功是不可想像的。”国际金融界权威刊物 *Institutional Investor* 也将此上市评为全球十优融资项目。

我对自己的个人利益考虑很少，我将自己应得的16万股赠送给了“金杯客车”的160位基层干部，在上市过程中我将“国家”两字看得更重，我的富国实践从来都伴随着我的爱国情操，经我的要求，美国纽约证交所及各地路演会场均挂起了五星国旗。

已被美国金融博物馆收藏为永久展览品的我设计的华晨股票，核心部分是由代表中国的万里长城和美国的华尔街标志性建筑构成，其中万里长城被 I 有意设计成高出华尔街主建筑数毫米，预示着中国未来的远大前程，这也是我富国梦的一部分。

进入世界管理金融类论文全球引用率最高前十名

时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

地点：香港、新加坡

1994年底，我受邀担任了跨国集团YTL（东南亚最大的电力、基建集团）的中国董事总经理，参与了YTL在东京的整体上市及电力业务分拆上市，这是第一家亚洲企业在东京成功上市。我也担任美、日、港、新、中许多跨国企业的顾问，曾为民生银行、春兰集团等多个大型企业做过卓有成效的咨询。1998年，我受聘赴新加坡国立大学金融与会计系担任院士，成为新加坡当地倍受重视的金融学家，先后六十多次上新加坡国家电视台就中新金融合作演讲，至今我仍然担任新加坡交易所的总裁顾问。

学术上，我开始进入了多产期和活跃期，一年里我相继在国际金融管理年会、欧洲金融市场年会、澳亚金融年会、欧洲货币会议、世界银行会议等十几个权威国际学术会议担任主讲嘉宾和专题主席。

目前，我已有多项世界首创成果发表于国际TOP 5顶级学报，如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IEEE 工程管理学报》, 被遴选进 SSRN。“SSRN”是全球唯一权威的涵盖管理、金融、会计、经济和法律五个管理学科的管理学论文摘要系统,其理事均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来自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伯克莱加州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界泰斗。其中,我于2001年5月31日在欧洲金融学年会上发表的首创成果“金融资产定价与风险测量的多变量模型”进入了世界管理金融类论文全球引用率最高的前十名。商界、学界同时获“十优”荣誉,殊属不易。

我另外五项首创成果列入 SSRN 的是:①《创投基金的表现》与《创投资本家的作用》,两篇论文已分别发表于顶级学报《金融研究学报》、《银行与金融学报》;②《科技股中金融变量与科技变量的信号功能比较》分析了科技泡沫的成因,该文与权威学者 William Megginson 合作,是国际金融学会多伦多年会的主题报告;③《在不同市场形态下新上市公司首日溢价》论文获权威学者 Jay Ritter 教授合作,在阿姆斯特丹、悉尼、新加坡等众多国际金融会议上赢得赞誉;④《科技成果评价指标体系》发表于顶级学报《IEEE 工程管理学报》;⑤《东亚经济整合和统一货币》,获刊于牛津大学《亚太学报》,在“全球一体化与 WTO”国际会议作主题报告,获 WTO 领导层肯定。由于以上一系列的首创性成果奠定了我的国际学术地位,我是国内金融学者中唯一一位被遴选为同时担任国际金融学会和亚太金融学会审稿委员的教授。

金融资产定价一直是金融学界的核心课题,五十年来,金融学界一直采用 CAPM 模型进行证券定价。1992年, FAMA 教授对此提出异议,并提出双变量模型对此修正。我于1998年开始对此课题进行了理论研究与大样本实证研究,提出了采用财务报表中提取出来的变量,对金融资产进行定价与风险测量,这一模型不但使证券定价的准确性获得极大提高,而且具有指导投资的功能,在金融证券业具有极大的实用价值并得到了国际学界的首肯。我回国以后,用汪氏模型对国内全部1270家上市公司做了大样本实证研究,证明了该模型在中国股市的实用价值,可用以分析、选股、公司素质分类、确定指数成分股、国有股减持依据,在去年熊市的情况下,汪氏模型推荐的第一类优质股平均回报

达40%，最高达130%。我的这些成果已收入新著《汪氏模型：寻找值得投资的公司》和《富国论》。路透社认为汪氏模型对中国资本市场投资估价分析具有很强的实践应用价值，决定将汪氏模型应用于路透全球金融信息系统50万台3000XTRA终端，为全球基金经理服务，目前中国的整个证券和基金业界也都采用了汪氏模型。我成功推动了全国投资理念向基本面分析的转变。

国家智囊、民族良心、人民喉舌

时间：进入21世纪

地点：中国国内各地

金融资本，是市场经济的最高形态；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心脏和动脉。我深切地感到让国际资本运作的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中国的富强和企业现代化至关重要。

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了WTO，中国金融业同国际接轨的时候到来了，特别在目前金融漏洞给国家和企业造成巨大损失的现状下，中国急需培养一大批证券、银行、会计方面的高级专业人才，我深感自己有责任来担当这个金融学科的带头人。2001年，我带着学识和经验回到了国内，担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八级教授，创建并担任浙大资本市场与会计中心主任，该中心获陈嘉庚先生创建的新加坡李氏基金拨款35万港元。我还兼任了国内外八所优秀大学的客座教授。经人事部特批，我是首批获得中国“绿卡”的七位外籍专家之一。

我认为：关注民生，关注广大人民的利益，关注企业的价值和增值，是一个金融学者的首要责任。如果说以前自己在海外，信奉的是“爱国、亲民、亲商”的六字原则；现在回到国内，这六字顺序就应改为“亲民、亲商、爱国”了。通过调查研究我发现了一系列问题：例如，我发现现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太低，没有随十年的通货膨胀而调整；现行财税政策偏重于“重税”，不利于企业和国家经济的发展，应当为企业和个人适当减税，取消利息税，调

整税收结构；我提出了纳税人主要是比较富裕者的观点，建议新设非道德税及消遣税，应该善于经营国家资产和储备，提高收益率等；我指出盲目多元化、盲目海外买壳的误区和陷阱；我大力推动基本面分析的投资方法并成为了业界的共识。在海内外很多重量级人物大力鼓吹人民币升值的浪潮中，我又一次撰文坚定地捍卫了稳定汇率的国策，一年来事实证明我一直坚持的稳定汇率的国策效果是好的。

回国后，我被央视主持人王小丫誉为“中国基辛格”，大量出版了专著，发表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政策建议，例如：不要神化WTO，与第三世界国家合作参与WTO的改革，积极参与亚太整合，推动东亚统一货币，企业管理必须以价值增值为核心，国有股出售给民营企业，新财税模型(可获2600亿的盈余)，成立国有控股公司，成立银监会、国资委，保护企业家资源，企业家EBO方案等，这一系列建言，都是我二十年的实践和理论的经验总结，都是在对中国国情把握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帮助了许多大型、中小企业避开了误区、创造了巨大价值。

我继续在国际保持一流学者的学术影响，在国际顶级金融学报一直有创新成果发表、国内出版专著6本，出版了新著《基本面分析：汪氏模型2004新版》、《金融与会计学学位论文汪氏范本》，另两本论文集在出版中。在国际会议（第六届高交会、中国国际金融论坛、澳亚金融年会、亚洲资本论坛）主讲6次，担任8所大学客座教授、国际金融学会审稿委员。赴国际多所著名大学讲学。

2004年，我持续不断、大声疾呼推动基本面投资方法，在《中华工商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东方早报》发表了80篇政策文章，提出了挽救证券业的众多政策，使基本面分析成为证券业界的主流。年底在“中国国际金融论坛”用《汪氏模型》评选出全国十佳企业（其中苏宁、三一等股价已升70%）。目前股市主流资本回归理性，股价两极分化，我作为唯一的基本面分析奠基人，以及我2002年影响力很大的专著《汪氏模型》功不可没。在国内外许多重量级人物鼓吹人民币升值的潮流中，我力排众议在内参、在

国际会议、在全国主要报刊连续撰文，坚持稳定汇率的国策，抗住人民币升值压力，国家采纳后效果良好。在国企大辩论中，在《新民周刊》、《新浪网》等发文，以坚实的实证研究反驳郎咸平，在湖南经济电视台与郎的辩论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为保护民营企业、为亿万国企职工的工龄买断费和国企改革前途争取了利益。我一直大力呼吁为民众和企业减税，提议企业所得税降至25%，取消利息税，个税起征点升至4000元，并提出10项向富人征收的税种，可为国家增加2600亿收入，我的减税政策已被国税局原则采纳。

我呼吁并一直推动使中小企业板和三板顺利成立。我推动成立十个股份制银行获得突破，浙商银行已成立，渤海银行等已筹建。作为新加坡交易所总裁顾问，我推动中小企业赴新加坡上市获得实质进展，2004年共有13家企业赴新上市。我推动的东亚经济整合已取得积极效果，今年底将筹建东亚峰会。我为温总理交办的“中建行、中行两行上市”课题提供了最佳方案，获得温总理高度嘉奖。现神木集团、中建行、交行上市方案即采用我建议的A+H方案。2005年我受聘任《财富论坛》与国务院新闻办联合制作的《中国资讯》金融行业首席顾问、金融业分册唯一作者。我还受邀为政府参事室、外经委作主题报告，内容为：跨国公司、服务业、金融业。受邀为浦东干部管理学院的特大型国企总裁班授课。受邀担任浙商论坛2005峰会、中国交通协会物流峰会、中国传媒投资峰会、国际亚洲研究学者第四届大会等的主演讲人。

在其他众多重大问题上为国家挽回资产损失；在其他众多企业“走出去”问题、“多元化”问题上都有精辟文章；为国内的国有、民营企业提供许多宝贵建议和咨询。网上搜索汪康懋已达万条。雅虎将我列为中国六大经济学家之一。

中资企业走出海外需要专业财技护航

在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海外上市事件上，我为国务院领导提出的建议得到了采纳，这两家银行都将赴纽约上市的计划改为香港上海同时上市